

# 汉代的经今古文学

孙钦善

汉代经书分今古文，例如《周易》，田何所传为古文，有施雠、孟喜、梁丘贺等家；秘府所藏“中古文《易经》”，为古文，民间亦有费直、高相两家流传。《尚书》，伏胜所传为今文，孔安国所传（得之孔子旧宅壁中）为古文。《诗经》，今文有三家，即鲁国申培，齐国辕固、燕国韩婴，古文为毛氏。《仪礼》，高堂生所传为今文，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五十六篇为古文。《春秋》，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为今文（或说《谷梁传》为古文），《左传》为古文。《孝经》，颜贞所传为今文，孔安国所传为古文。《论语》，《鲁论》、《齐论》属今文，孔安国所传《古论》为古文，等等（详见《史记·儒林传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及《儒林传》）。

经今古文是汉代文献学中的重要问题，而且在整个古文献学史上影响深远。本文拟就经今古文的区别、今古文经书的来源、汉代今古文之争的始末、今古文的学术评价等四个问题作一些介绍和论述。

今古文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


第一、经书写本不同，主要表现在三方面：

1. 书写字体不同。今文经是汉时著于竹帛的隶书写本，而古文经则是先秦保存下来的六国文字抄的古本。

所谓“古文”，是汉人所用的一个术语，其义有歧而又相

关，正如王国维所考，或“以学派言之”，或“以文字言之”（见《观堂集林》卷七：《汉书所谓古文说》、《说文所谓古文说》）。即“以文字言之”，其文献范围亦有参差。广义如王国维在《史记所谓古文说》中所言：“凡先秦六国遗书，非当时写本者，皆谓之古文”，“太史公所谓古文，皆先秦写本旧书。……惟六艺之书为秦所焚，故写本较少，然汉中秘有《易古文经》，河间献王有古文先秦旧书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，固不独孔壁书为然。”狭义如王国维所言：“自武、昭以后，先秦古书传世益少，其存者往往归于秘府，于是古文之名渐为壁中书（孔壁所发现的古书）所专有。”（同前）古文文献的范围，在汉人的观念中虽有广狭之别，而古文作为文字形体的概念，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则是确定无异的，即被认为是不仅在隶书、小篆之先、而且在大篆之先的一种比较难于辨识的较古的文字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说：“年十岁则诵古文”。我们知道，汉代幼童先入小学，识字习字，不仅学隶书，也学《三苍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小学序》说：“《苍颉》七章者，秦丞相李斯所作也；《爰历》六章者，车府令赵高所作也；《博学》七章者，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；文字多取《史籀篇》，而篆体复颇异，所谓秦篆者也。……汉兴，闾里书师合《苍颉》、《爰历》、《博学》三篇，断六十字为一章，凡五十五章，并为《苍颉篇》（按，即《三苍》）。”可知《三苍》以小篆文字为主。而司马迁“十岁能诵古文”，则已远远超出当时学童的水平。至于《史籀篇》，传说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编的一部字书，其字体即《说文解字序》所称之“史籀大篆”。籀文虽比小篆为古，但属于同一系，差别不大。而籀文与古文则形体迥异，如《汉书·艺文志·小学序》说：“《史籀篇》者，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，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。”《说文解字序》也将古籀并称，且明指古文为古文经书所专有，如说“今叙篆文，合以古、籀，……其称《易》孟氏（按，孟喜《易》”

实为今文)、《书》孔氏、《诗》毛氏、礼《周官》、《春秋》左氏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皆古文也。”可见《说文解字》中的古文，主要采自古文经传。又魏正始三体石经中的古文也并非臆造，而是确实根据当时传抄的古文经书中的字体摹写刻石的。它与《说文解字》中的古文在风格上是一致的。这种风格特殊的字体，其中有不少字比籀文还难辨识，因此被汉人称作“古文”。其实古文的使用时代并不古，经近人考证，古文实为战国时期东方六国韩、赵、魏、齐、楚、燕以及周、鲁等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字，详见王国维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》、《说文所谓古文说》等文（《观堂集林》卷七）孙海波《魏三字石经集录·古文》及唐兰《中国文字学》。这种说法不断为新发现的战国文字资料所证实。因为战国时代东方各国俗体字的大量涌现，发展成相对独立的系统，对秦国篆文所承袭的商周文字的正统体系有很大突破，因此才被汉代人误认为一种较古的文字。汉代在孔壁及民间发现的古文经书，大多是秦始皇焚书时藏匿起来的，其为东方诸国文字的写本，便是理所当然的事。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认为古文经的字体为籀文，是不妥当的。古文字体在《说文解字》及魏三体石经残石中保存了许多，现参考商承祚《说文中之古文考》及孙海波《魏三字石经集录·古文》略选数例以见一斑：

 《说文》：“保（保），养也。从人从采省。采，古文孚。采，古文保（保）。，古文保，不省。”《左传》庄公六年《春秋》经：“齐人来归卫俘。”杜预注：“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经传皆言‘卫宝’，此传（指《左传》传文）亦言‘宝’惟此经言‘俘’，疑经误。”《正义》云：“案《说文》，保从人采省声（按，当为省形），古文保不省。然则古字通作‘宝’；或‘保’字与‘俘’相似，故误作‘俘’。”孔颖达此说前半为是。按《说文》：“采，古文孚。”既然“俘”之右旁古文为“采”，则“保”作“俘”亦不误。且古无轻

唇音，“保”“俘”音同。由此可知，《左传》所据《春秋经》之“俘”即古文“係”，为“宝”之假借字。

又如：

𠄎 《说文》：“𠄎（𦉳），𠄎器也，从𠄎𦉳声。𠄎，古文𦉳，象形。《论语》曰：“有荷𠄎而过孔氏之门。”这里所引即古文《论语》，今文鲁《论语》“𠄎”作“𦉳”。

再如：

𦉳 《说文》：“𦉳（𦉳），槎识也。从木𦉳，𦉳。夏书曰：“随山𦉳木。”读若刊。𦉳，篆文，从𦉳。”既然篆文从𦉳，则从𦉳者为古文。所引“夏书，即《尚书·夏书·禹贡》，其为古文《尚书》无疑。

𠄎 中，见《三体石经·尚书尧典》及《无逸》。孙海波按：《说文》中古文作𠄎。籀文作𠄎。徵之古文，甲、金文中作𠄎𠄎𠄎，其游中曲。晚周文字中都币作𠄎，铤文作𠄎𠄎𠄎，𠄎文作𠄎，其游平直，此六国文字之特征也。

𠄎 春，见《三体石经·春秋》庄公二十八年及文公元年。孙海波按：《说文》：春，从日，从𠄎，屯声。此不从艸。

𦉳 革，见《三体石经·尚书多士》。孙海波按：《说文》古文作𦉳，铤文作𦉳，并与此同。

𦉳 夏，见《三体石经·尚书多士》、《多方》、《君奭》及《春秋》僖公二十八年。孙海波按：《说文》古文作𦉳，铤文作𦉳，与此近似。

2. 彼此有异文，即文字或语句不同。今古文经书写本的不同不仅表现在文字形体的差别上，还表现在字句的差别上，各经注疏及《经典释文》保存了这方面丰富的材料。今古文经字句的差异，有的书情况颇为严重。如《汉书·艺文志·孝经序》说：

“汉兴，长孙氏、博士江翁、少府后仓、谏大夫翼奉、安昌侯张

禹传之，各自名家，经文皆同。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。‘父母生之，续莫大焉’，‘故亲生之膝下’，诸家说不安处，古文字读皆异。”师古曰：“桓谭《新论》云：‘古《孝经》千八百七十二字，今异者四百余字。’”异文几乎占四分之一。又如《论语》，古文与今文齐、鲁二家文句多异，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注引桓谭《新论》云：“文异音四百余字。”又《经典释文》于《论语·学而第一》“傳不”二字下云：“案郑（玄）校周之本（鲁论），以齐、古读正凡五十事。”《经典释文》中还保存了许多有关《论语》今古文的异文材料，如：

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天何言哉：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”《经典释文》录郑玄注：“鲁读‘天’为‘夫’，今从古。”

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已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殆而。”《经典释文》录郑玄注：“鲁读‘期斯已矣，今之从政者殆’，今从古。”

再如《诗经》，古文《毛诗》与今文齐、鲁、韩三家多异文。如：

《毛诗·周南·何彼穠矣》：“何彼穠矣”，穠，《经典释文》：“《韩诗》作“莪”。

《毛诗·陈风·衡门》：“泌之洋洋，可以乐饥。”郑笺云：“泌水之流洋洋然，饥者见之，可饮以瘵饥。”知郑玄本作“瘵”，当据今文《鲁诗》。《韩诗外传》作“瘵”。

再如《仪礼》，郑玄注本文字或从古文，或从今文，注中多有说明，可以窥见今古之别：

《士冠礼》：“布席于门中，闾西闾外”，郑注：“古文‘闾’为‘櫛’，‘闾’为‘蹙’。”

《特牲馈食礼》：“举觶者皆奠觶于荐右”，郑注：“今文曰‘奠于荐右’。”

又：“祝命尝食养”，郑注：“古文‘饔’皆作‘餼’。”再如《左传》，《汉书·楚元王传附刘歆传》说：“初《左氏传》多古字古言”，如《周礼·小宗伯》郑玄注引郑司农云：“古者‘立’‘位’同字，《古文春秋经》（《左传》所据）·公即位·（桓公元年）为‘公即位’。”而今传《左传》经传中古字绝少，盖已为后代经师所改。

3. 篇章不同。如《春秋》经文，古文《左传》与今文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不同。《公》《谷》二传经文至哀公十四年，而《左传》尚有哀公十五、十六两年经文，即哀公十四年经文，也较《公》《谷》二传内容为多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：“《春秋》古经十二篇。经十一卷（原注：公羊·谷梁二家）。”正反映了《春秋》古今文两种不同篇章的本子。又如《论语》，今古文分章多不同。分篇也是如此，《鲁论》二十篇，而何晏《论语集解序》说：“《古论》‘分《尧曰》下章‘子张问’以为一篇，有两《子张》，凡二十一篇。篇次不与《齐》、《鲁论》同。”

第二、说解不同。今古文作为学派的区别，主要表现在这一方面。王国维《汉书所谓古文说》：“而《志》（《艺文志》）于诸经外书皆不著古今字，盖诸经之冠以古字者，所以别其家数，非徒以其文字也。”所谓“家数”，即今文家、古文家，指学派而言。龚自珍《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》：“今文、古文同出孔子之手、一为伏生之徒读之，一为孔安国读之（按，此举《尚书》为例），未读之先，皆古文矣，既读之后，皆今文矣。惟读者人不同，其说不同。……如后世翻译，一语言也，而两译之，三译之，或至七译之。”这说明今古文同源而异流，因说解而分歧。今古文家说解内容的不同，不仅表现在训诂、名物方面，尤其表现在事实、典制方面。具体情况散见于传注之中。许慎著有《五经异义》，以专题类目为纲，广泛收集了古文《尚书》说，今

《尚书》夏侯、欧阳说；古《毛诗》说，今《诗》韩、鲁说；古《周礼》说，今《礼》戴说；古《春秋左氏》说，今《春秋公羊》说；古《孝经》说，今《孝经》说。今古文世解的侧重点也不同，今文家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，用以垂教万世，或托古改制，于是多阐发其中的“微言大义”，并掺杂讖言阴阳；古文则认为六经皆史，孔子述而不作，于是说解侧重章句训诂、名物典制。

第三、宗旨不同。今文家标榜“经世致用”，即强调经书的直接的、简单化的实用目的。如前汉今文家以《尚书·禹贡》治河（见《汉书·平当传》），以《尚书·洪范》察变（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）以《春秋》治狱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：《公羊董仲舒治狱》十六篇），以《诗经》当谏书（见《汉书·儒林传·王式传》），或当规戒（如《韩诗外传》）等；此外今文学多言阴阳灾异，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，把儒学神化，为巩固现实统治服务。因此说解经书往往牵强附会。古文家以求对经书本身作确实地理解，因此多从弄通语言文字入手，学术性较强。当然在解释古事时每涉及思想内容，也难免附会为说，但这与今文家生硬地与现实牵连比附是不相同的。

以上是今古文的主要区别。在谈汉代今古文之争之前，须先介绍一下今古文经书的来历。

今文经的来历主要是口耳相传，著之竹帛。如《公羊传》，经过公羊氏五世口传，至汉始著于竹帛。《公羊传注·何休序》徐彦疏引“戴宏序云：子夏传与公羊高，高传与其子平，平传与其子地，地传与其子敢，敢传与其子寿。至汉景帝时，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。”又如今文《尚书》，据《论衡·正说篇》说，是伏生口授，由晁错记录下来的。其实今文经的祖本皆为古文，今文经本系由今文经师改易古文本而成。如《尚书》的伏生传本是伏生以今文改易古文本而成。刘歆《让太常博士书》说：“至孝文皇帝，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

初出于屋壁，朽折散绝，今其书见在，时师传读而已。”所谓“时师，”即指今文经师，所谓“传读”，即指传今文读本。又《史记·儒林传》：“孔氏有《古文尚书》，而安国以今文读之。”所谓“以今文读之，”即指以今文定其章句，道其假借，加以说解。

古文经的来历则是流传下来或重新发现的经书古本。

流传不断的如古《周易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及秦燔书，而《易》为筮卜之事，传者不绝。汉兴，田何传之，讫于宣、元，有施孟、梁丘、京氏列于学官，而民间有费、高二家之说。刘向以中古文《易经》校施、孟、梁丘经，或脱去‘无咎’、‘悔亡’，唯费氏经与古文同。”所谓“中古文《易经》”，即秘府（朝廷藏书之所）所藏古文《周易》，费氏所传与此本相同。又如《左传》，《汉书·儒林传》说：“汉兴，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、京兆尹张敞、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《左氏春秋传》”，此后流传不废。《说文解字叙》说：“北平张苍献《春秋左氏传》。”《汉书·楚元王传附刘歆传》说：“歆校秘书，见古文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大好之。从尹咸及丞相翟方进问大义。初，《左氏传》多古字古言，学者传训诂而已。”又载刘歆《让太常博士书》云：“《春秋左氏》，丘明所修，皆古文旧说，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，伏而未发。……传问民间，则有鲁国桓公、赵国贯公、胶东庸生三遗学与此同。”可见《左传》既有秘府所藏，又有学者所传，只是传者多改易字体，多失古本原貌，故刘歆说古文《左氏传》“藏于秘府，伏而未发”。再如《毛诗》，史载亦流传不废，虽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郑玄《诗谱》、陆玑《〈毛诗〉草木鸟兽虫鱼疏》及《经典释文》各家具体说法纷纭参差，《诗序》亦为汉人所作，但《诗经》本文及训诂来自前代当属无疑。当然，世传的古文经书，在流传过程中，难免不改易古字，有失原貌。王国维在《汉时古文诸经考》中说：“《汉书·

艺文志》：《毛诗》二十九卷，不言其为古文，《河间献王传》列举其所得古文旧书，亦无《毛诗》，至后汉始以《毛诗》与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并称，……其实《毛诗》当小毛公、贯长卿之时，已不复有古文本矣。”这种推测不无道理。

重新发现的经书古本有：

1. 孔子旧宅壁中所藏古文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

刘歆《让太常博士书》说：“及鲁恭王（刘余）坏孔子旧宅，欲以为宫，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：《逸礼》有三十九篇，《书》十六篇。天汉之后，孔安国（据荀悦《汉纪·成帝纪》，此下当有“家”字）献之，遭巫蛊仓卒之难，未及施行。”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武帝末（当为景帝时），鲁共王坏孔子宅，欲以广其宫，而得古文《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凡数十篇，皆古字也。”

《论衡·正说篇》：“至景帝时（《佚文篇》、《案书篇》又作“武帝时”），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，得百篇《尚书》于墙壁中。武帝使使者取视，莫能读者，遂秘于中，外不得见。”

《说文解字叙》：“壁中书者，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”

关于拆壁得书的时间，几处记载有异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作“武帝末”，显误，鲁恭王死于武帝元朔二年（公元前127年），正值武帝十三年，不得有武帝末坏宅建宫之事。又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·鲁恭王传》：“鲁恭王余，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。吴楚反，破后，以孝景前三年（公元前154年）徙王鲁。好治宫室苑囿狗马。季年好音，不喜辞。为人口吃难言。二十八年（指做鲁王）薨。……恭王初好治宫室。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，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，于其壁中得故经传。”据此，其好治宫

室，毁孔宅以广其宫在王鲁之初，时值景帝时或武帝初。

## 2. 民间所藏。

(1) 鲁国淹中(里名)所出《礼》古经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《礼》古经者，出于鲁淹中，及孔氏学七十篇，文相似，多三十九篇。”(刘敞曰：“读当云：‘《礼》古经者，出于鲁淹中及孔氏’，孔氏则安国所得壁中书也。”又曰：“‘学七十篇’当作‘与十七篇文相似’，五十六篇，除十七，正多三十九也。”) )

(2) 河间献王得民间所藏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等。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·河间献王传》：“河间献王德，以孝景前二年立，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，从民间得善书，必为好写与之，留其真，加金帛赐以招之。繇是四方道术之人，不远千里，或有先祖旧书，多奉以奏献王者，故得书多，与汉朝等。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，所招致，率多浮辩。献王所得书，皆古文先秦旧书，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之属，皆经传说记、七十子之徒所论。”

(3) 民间壁中得《尚书·泰誓》。刘向《别录》：“武帝末，民有得《泰誓》于壁内者，献之。与博士，使读说之，数月皆起传以教人。”(《尚书序》疏引)郑玄《书论》：“民间得《泰誓》。”(同前)

(4) 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逸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尚书》。《论衡·正说篇》：“至孝宣皇帝之时，河内女子发老屋，得逸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尚书》各一篇，奏之。”《尚书序》疏：“王充《论衡》及后汉史，献帝建安十四年，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：‘宣帝本始元年，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《泰誓》三篇。’《论衡》又云：‘以掘地所得者’(按今《论衡》无此文)。”

(5) 杜林得漆书古文《尚书》。《后汉书·杜林传》：

“林前于西州（西汉末曾客河西）得漆书古文《尚书》一卷，常宝爱之，虽遭艰困，握持不离身。出以示（卫）宏等，曰：‘林流离兵乱，常恐斯经将绝，何意东海卫子（宏）、济南徐生（巡）复能傅之，是道竟不坠于地也。古文虽不合时务，然愿诸生无悔所学。’宏、巡盖重之，于是古文遂行。”

以上记载虽不一一可靠，但秦始皇焚书时民间所藏的经书在汉代被陆续发现，是完全可能的。计上述从各种途径得到的古文经共有十种，即：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礼经》、（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官》、（《周礼》））、《春秋经》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

古文经的发现，是汉代史学和古文献学的一件大事，但遭到今文家的强烈反对。今文学是根植于现实思想政治土壤的一种学派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，垄断着西汉一代及东汉初年的思想文化领域。西汉自文帝起，开始置博士官，如《后汉书·翟酺传》说：“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。”《汉书·楚元王传附刘歆传》说：“至孝文皇帝，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《尚书》，《诗》始萌芽，天下众书往往颇出，皆诸子传记，犹广立学官，为置博士。”王国维《汉魏博士考》（见《观堂集林》卷四）说：“考文景时博士，如张生，如晁错，乃《书》博士；如申公，如辕固，如韩婴，乃《诗》博士，如胡毋生，如董仲舒，乃《春秋》博士。”皆属今文。自汉武帝起至西汉末，除平帝及王莽时曾一度立古文经之外，也是今文的一统天下，如《汉书·儒林传赞》说：“自武帝立五经博士，开弟子员，设科射策，劝以官禄，讫于元始，百有余年，传业者寔盛，支叶蕃滋，一经说至百余万言，大师众至千余人，盖禄利之路然也。初，《书》唯有欧阳，《礼》后（苍），《易》杨（何），《春秋》公羊而已。至孝宣世，复立大、小夏侯《尚书》，大小戴《礼》，施、孟、梁丘《易》，谷梁《春秋》。至元帝世，复立京氏《易》。平帝时，又立《左氏

春秋》、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，所以罔罗遗失，兼而存之，是在其中矣。”虽然平帝时立过古文经，王莽时立过《乐经》（见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）和《周礼》（见《汉书·刘歆传》）。但是东汉一开始便罢废古文博士，完全承袭西汉，立今文十四博士。《续汉书·百官志》：“博士十四人。”本注曰：“《易》四：施、孟、梁邱、京氏；《尚书》三：欧阳、大、小夏侯；《诗》三：鲁、齐、韩氏；《礼》二：大、小戴氏；《春秋》二：《公羊》严、颜氏。”《后汉书·儒林传序》：“及光武中兴，爱好儒术，……于是立五经博士，各以家法教授。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邱、京氏；《尚书》欧阳、大、小夏侯；《诗》齐、鲁、韩、毛（“毛”字衍）；《礼》大、小戴；《春秋》严、颜，凡十四博士。”后虽立《春秋》左氏、谷梁博士，不久而罢。仅立今文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末。与西汉有所不同的是，东汉政府自章帝开始在学术上比较重视古文，《后汉书·儒林传序》说：“建初中，……又诏高才生受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虽不立学官，然皆擢高弟为讲郎，给事近署，所以网罗遗逸，博存众家。”但今文家的政治地位仍是古文家无法攀比的。今文家为维护自己独霸的“利禄之路，”也总是千方百计贬抑古文学。

如前所述，汉初即有古文经书流传，但古文经书接连不断被重新发现，是从景帝武帝之际鲁恭王发现孔氏壁中经开始的。随着古文经学声势的不断壮大，古文学家对本学派受压抑状况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，今古文之争势在必行。这场论争的正式揭幕在成帝、哀帝之际。《汉书·楚元王传附刘歆传》载：

及歆亲近，欲建立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，皆列于学官。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，诸博士或不肯置对。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：“……陵夷至于暴秦，焚经书，杀儒士，设挟书之法，行是古之

罪，道术由是遂灭。汉兴，去圣帝明王遐远，仲尼之道又绝，法度无所因袭。时独有一叔孙通，畧定礼仪，天下唯有《易》卜，未有它书。至孝惠之世，乃除挟书之律，然公卿大臣绦、灌之属，咸介冑武夫，莫以为意。至孝文皇帝，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初出于屋壁，朽折散绝，今其书见在，时师传读而已。《诗》始萌芽。天下众书往往颇出，皆诸子传说，犹广立于学官，为置博士。在汉朝之儒，唯贾生而已。至孝武皇帝，然后邹、鲁、梁、赵颇有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春秋》先师，皆起于建元之间。当此之时，一人不能独尽其经，或为《雅》、或为《颂》，相合而成。《泰誓》后得，博士集而读之。故诏书称曰：‘礼坏乐崩，书缺简脱，朕甚闵焉。’时汉兴已七八十年，离于全经，固已远矣。及鲁恭王坏孔子宅，欲以为宫，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，《逸礼》有三十九篇，《书》十六篇。天汉之后，孔安国（荀悦《汉记》此下有“家”字）献之，遭巫蛊仓卒之难，未及施行。及《春秋》左氏丘明所修，皆古文旧书，多者二十余通，臧于秘府，伏而未发。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，稍离其真，乃陈发秘臧，校理旧文，得此三事，以考学官所传，经或脱简，传或间编。传问民间，则有鲁国桓公、赵国贯公、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，抑而未施。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，士君子之所嗟痛也。往者缀学之士，不思废绝之阙，苟因陋就寡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学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艺。信口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，至于国家将有大事，若立辟雍、封禅、巡狩之仪，则幽冥而不知其原。犹欲保残守缺，挟恐见破之私意，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，或怀妒嫉，不考情实，雷同相从，随声是非，抑此三学，以《尚书》为备，谓《左氏》为不传《春秋》，岂不哀哉！今圣上（指哀帝）德通神明，继统扬业，亦闵文学错乱，学士若

兹，虽昭其情，犹依违谦让，乐与士君子同之。故下明诏，试《左氏》可立不，遣近臣奉指衔命，将以辅弱扶微，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，冀得废遗。今则不然，深闭固距（同“拒”），而不肯试，猥以不诵绝之，欲以杜塞余道，减绝微学。……且此数家之事，皆先帝所亲论，今上所考视，其古文旧书，皆有徵验，外内相应，岂苟而已矣。夫礼失求之于野，古文不犹愈于野乎？……传曰：‘文武之道未坠于地，在人；名者志其大者，不贤者志其小者。’今此数家之言，所以兼包大小之义，岂可偏绝哉！若必专己守残，党同门，妒道真，违明诏，失圣意，以陷于文吏之议，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！”其言甚切，诸儒皆怨恨。是时各儒光禄大夫龚胜，以欲移书，上疏深自罪责，愿乞骸骨罢。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，亦大怒，奏欲改乱旧章，非毁先帝所立（今文经）。上曰：“欲欲广道术，亦何以为非毁哉？”欲由是忤执政大臣，为众儒所讪，惧诛，求出补吏。

这一段记载，是关于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原始文献，故不惮其详微引于此。这里说明了几个问题，第一，刘歆立古文的建议受到哀帝的支持，却受到当政的今文大儒的激烈反对，终败下风。但也产生了影响，平帝立古文经及东汉古文学在学术上的兴起就是例证。第二，指出今文家反对古文，实出于垄断学术之私意，表现出“保残守缺”，“专己守残，党同门，妒道真”的腐朽的门户之见。第三，在学术上将今古文作了比较，认为今文经为秦火之余，今文家“因陋就寡，”烦琐臆断；而“古文旧书，皆有徵验，”今文家对古文经的贬抑之辞，纯属诬妄。

继刘歆之后，东汉时今古文之争仍持续不断。荀悦《汉纪》论东汉建立后的经学说：“古文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周官》，通人学者多好尚之，然希得立于学官。”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·六艺略序》批评今文家：“后世经传既已乖

离，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，而务碎义逃难，便辞巧说，破坏形体，说五字之文（指秦近君说《尚书·尧典》篇题二字及开头“若稽古”三字），至于二、三万言。后进弥以驰逐，故幼童而守一艺，白首而后能言，安其所习，毁所不见，终以自蔽，此学者之大患也。”此当袭刘韵《七略》之说。又《后汉书·范升传》载：光武建武二年（26年），尚书令韩歆上疏，欲为《费氏易》、《左氏春秋》立博士。光武帝下其议，并于建武四年召集公卿大夫博士于云台展开论辩。范升对曰：“《左氏》不祖孔子，而出于丘明，师徒相传，又无其人，且非先帝所存，无因得立。”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，日中乃罢。之后范升又接连上奏谏阻立古文经。《后汉书·陈元传》载：建武初，陈元与桓谭、杜林、郑兴等古文家俱为学者所宗。陈元与范升反复辩难，争立《左传》，光武帝卒立《左传》，以李封为博士。于是诸儒哗然，自公卿以下，数廷争之。适逢博士李封病死，《左传》又废。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载：章帝立，特好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左氏传》。建初元年（76年）、诏贾逵入讲北宫白虎观、南宫云台，章帝善逵说，使出《左氏传》大义长于二传者，逵于是具条陈之。光武帝时，《左氏》、《谷梁》二家先师，因不晓图讖，中道而废，贾逵接受这一教训，于是附会图讖，争立《左传》。结果得到章帝嘉许，受命自选《公羊》严、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《左氏》。贾逵还多次对章帝说，《古文尚书》与经传《尔雅》诂训相应，遂受诏撰《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》，集为三卷，章帝善之。又受诏撰《齐鲁韩诗与毛诗异同》，并作《周官解诂》。建初八年，章帝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《左氏》、《谷梁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，由是四经遂行于世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·李育传》载：李育少习《公羊春秋》，颇涉猎古学，虽喜《左传》之文采，然谓不得圣人深意，作《难左氏义四十一事》。建初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，李育以《公

羊义难贾逵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·何休传》载：何休作《春秋公羊解诂》，又以《春秋》驳汉事六百余条，妙得《公羊》本意。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，以难二传，作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谷梁废疾》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·服虔传》载：服虔作《春秋左氏传解》，又以《左传》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·许慎传》载：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，于是撰为《五经异义》，是古非今。又其《说文解字叙》亦驳今文家对古文经的诋毁：“壁中书者，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又北平侯张仓献《春秋左氏传》，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，其铭即前代之古文，皆自相似，虽叵复见远流，其详可得略说也。而世人大共非訾，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，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，变乱常行以耀于世。”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载：郑玄学兼古今，而以故为主。“时任城何休好《公羊》学，遂著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谷梁废疾》，玄乃《发墨守》、《针膏肓》、《起废疾》，休见而歎曰：‘康成人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乎！’初范升、陈元、李育、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，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，及玄答何休，义据通深，由是古学遂明。”又郑玄曾撰《驳五经异义》，时用今文说驳许慎所主张的古文说。《后汉书·卢植传》载：灵帝熹平四年（175年），“时始立太学石经，以正五经文字。植乃上书曰：‘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，颇知今之《礼记》特多回冗，臣前以《周礼》诸经发起糝谬，敢率愚浅为之解诂，而家之无力供缮写上，愿得将能书生二人，共诣东观，就官财粮，专心研精，合《尚书》章句，考《礼记》失得，庶裁定圣典，刊正碑文。古文斜斗，近于为实，而压抑流俗，降在小学。中兴以来，通儒达士班固、贾逵、郑兴父子并敦悦之，其与《春秋》共相表里，宜置博士，为立学官，以助后来，以广圣意。’”此建议仍未被采纳。通过以上材料，可以综观东汉今古文之争的

概貌，其特点如下：第一，今文学始终占据官学席位，而古文经被排斥在外。第二，在学术界古文学逐渐取得优势，成为东汉经学的主流。当时古文名家众多，如卫宏、贾逵、郑兴、郑众、马融、许慎等，而今文名家不过何休一人而已。这反映了古文学在学术上的生命力，说明学术的是非由客观真理所决定，决不会单纯由官方的力量所左右。第三，今古文学在论争中互相渗透、吸收，对门户之见有所突破，出现以古文为主对今文兼容并蓄的现象。当时学兼今古的学者颇多，以郑玄为突出代表。但往往既受到正统今文学家的反对，也受到正统古文学家的反对。第四，今古文之争遍涉五经，尤以《春秋》为焦点，此书被今文家用来发挥微言大义，附会阴阳灾异，几乎成为其理论的安身立命之所。

由于汉代今古之争影响深远，前人评价今古文学多难摆脱派别门户之见，作出不符合实际的褒贬、论断。今文家认为古文经全系“向壁虚造”之伪作，古文家则认为今文经“保残守缺，全系穿凿附会之伪说。正确评价今古文，应该实事求是，具体分析，不可囿于各派门户之见。从总的倾向来看，今文学出于“经世致用”的目的，往往借题发挥，穿凿附会，例多伪说；而古文学则追求对经书的正确理解，多从切实弄清文字训诂、名物典制入手，力图达到对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，因此比较质实、可靠。王国维有《两汉古文家多小学家说》一文（见《观堂集林》卷七），举有张敞、桑钦、杜林、卫宏、徐巡、贾逵、许慎等人事迹为例，得出结论说：“由此观之，两汉古文家与小学家势有不可分之势，此足证其所传经本多为古文”，确切地说明了古文经学的特点和产生的缘由。但是今文经说也并不是一无是处，也包含不少正确的结论；古文经也并不是完全质实可靠，确有伪书、伪说。在伪书方面，如《周礼》一书，成书于战国时期，包括了周至战国的制度，并不如古文家所说是周公所作，反映了西周的制度。今文家对《周礼》的怀疑是正确的，但认为是刘歆所伪造

则又是不对的。当时的古文经确有托古作伪的情况，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载：“世所传百两篇（指《尚书》）者，出东莱张霸，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，又采《左氏传》、《书叙》为作首尾，凡百二篇，篇或数简，文意浅陋。成帝时，求古文者，霸以能为百两徵，以中书校之，非是。“张霸的百两篇《尚书》，就是伪造的《古文尚书》。但证其伪者，恰恰是秘府所藏孔壁发现的真《古文尚书》。古文家认为古文经传全系伪造，是没有根据的。至于伪说，古文家确有附会史事、穿凿立说的情况，如《毛诗小序》就是明显的例子，但这并不足以动摇古文经学比较质实的总的倾向。因此可以这样说，今文学提供了思想史上的重要资料，而古文学提供了文献学的重要经验和成果。在古文献学史上，今文学对后世的义理学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，而古文学对后世的训诂、考据学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

---

## 《笔记小说大观》全部出齐

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整理出版的《笔记小说大观》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古代文史资料汇编。该书共计三十五册，汇集了晋、唐、宋、元、金、明、清历代的笔记作品二百余种。

该书早在六十年前，上海进步书局曾出版过石印线装袖珍本。当时，限于条件，缮写、校对比较粗疏，字体不一，谬误、遗漏甚多。解放以后，其中若干种笔记曾由中华书局等出版社整理出版。一九八一年秋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从苏北农村收集到了这部巨著，内容完整无缺。该社为适应学术界的需要，采用排印和影印结合的办法，《大观》已于年前全部出齐。《大观》今天得以完整的再版问世，是该社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一大贡献。

· 林 敏 ·